

# “馅饼”与“陷阱”：经济增长之于政治稳定的双向效应

——基于法国大革命和亚非拉、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考察

黄毅峰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摘要:**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治稳定,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促成政治稳定,它们之间也并非完全同向运行。实际上,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目标。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的“伴生物”,时刻侵蚀着经济增长孕育的稳定基因。因此,经济增长对于政治稳定而言,其功能就表现出双向效应:它既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也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陷阱”。经济增长通向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是做到尽可能利用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而克服其负效应。

**关键词:**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双向效应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0)06-0007-08

美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考察后发现,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的一百年中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前二十年那样发展迅速,也就是说,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给法国路易十六的政治统治带来更好的社会稳定,相反它却酝酿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塞缪尔·亨廷顿通过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中的社会政治状况分析,“事实再次证明,较富裕的国家发生动乱的或然率比较贫穷国家高近两倍。并且,种族分歧比贫穷更容易成为动乱的导因”,“贫穷落后与动乱之间表面上的联系是不真实的”,“在现代化中国家,暴力、动乱和极端主义行为在较富裕的地区比在较贫穷的地区发生的频率更高”,“政治动乱的产生,不是由于缺少现代性,而是由于试图获得现代性,如果贫穷国家不稳定,那并非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力图致富。一个纯粹传统的社会可能会愚昧贫穷,但却是稳定的”。<sup>[1](P41-42)]</sup>20世纪50年代,印度曾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经济增长率极其低下,然而,印度社会却很少发生

政治动乱,保持了高度稳定;与此同时,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印度的10倍,经济增长率也相当可观,但政治稳定对于这两个国家而言,却可望不可及。塞缪尔·亨廷顿于是作出判断:“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sup>[1](P41)]</sup>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境况并未发生多大改变,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然而,虽然中国政治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实现了总体稳定,但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给中国政治稳定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孕育了大量不稳定基因,政治秩序遭遇了严峻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与压力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明显缓解的迹象。频繁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仍在考验着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给执政当局造成政治上的强大压力。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并没有自动保证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为公众对政治体系带来更高层次地认同。这就是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之间的悖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稳定。经济增

收稿日期:2010-09-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群体性事件中非直接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及调控机制研究》(10CSH041)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毅峰(1977-),男,江西南康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政府能力、政治冲突、群体性事件和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长既有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也有可能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陷阱”。

### 一、作为政治稳定“馅饼”的经济增长

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和集中体现。“一个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的国家，政治上一定是较为稳定和安定的”。<sup>[1] (P40)</sup>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古往今来，凡是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必定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反之，凡是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必定是物质文明衰弱或倒退的时代。<sup>[2]</sup> 因为，经济增长可以满足人民的经济利益需求，提升现代国家政府能力，推动民主精神逐渐形成与民主制度的生长，并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因此，经济增长之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实现和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它为政治稳定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的政治秩序犹如空中楼阁，任何一个细节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动荡甚至崩溃。

#### (一) 经济增长能够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社会期望

在人们所有的社会预期当中，经济利益的满足是最核心、最根本、也最为关键的内容，因为它是人类存续与发展的基础。因此，期望与现实的差距，往往是政治不稳定的直接动因。正如阿尔蒙德所言：“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进行分配，不仅是产生激烈冲突的根源，而且事实上阻碍了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所必须的资本积累”。<sup>[3] (P435)</sup> 如果把社会分配比喻为“分配蛋糕”，那么经济增长则是努力“做大蛋糕”的过程，显然“把蛋糕做大”是“分配蛋糕”的前提。没有“蛋糕”的分配犹如无米之炊，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永远无法满足公众的社会需求，这就不可避免会引发公众对资源配置的不满，并进一步转化为对现有政治体系的不满。因此，要满足公众的社会需求，离不开经济增长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物质财富，发挥经济增长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公众社会期望的功能。一方面，伴随人们期望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经济增长则可以不断提高满足期望的能力，经济增长减少了由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挫折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不满。与此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还会把人们的注意力由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转移，使人们集中精力关注经济的发展态势、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是政治制度的缺陷以及对政府的格格不入。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是预防极

端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国民收入低，社会资源短缺，不满情绪积淀，是极端主义产生的土壤。经济发展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安全，普及并提高了教育水平，使得低层阶级眼光变得较远，政治观点更加复杂，更接近渐进主义。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因此，可以说，国家愈富，地位低下的阶层就愈不易成为社会不满的重要因素。<sup>[4] (P41-44)</sup> 因为贫穷者最关心的是满足生存需要的直接利益，这些利益不是靠反对现存政治体系而获取，而只有通过现存政治体系才能予以保证。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只有一贫如洗、一无所有的人才会造反。所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让社会财富变得极大丰富，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社会期望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路径。

#### (二) 经济增长是政府能力的集中体现与根本保障

政府能力是一个包括政治统治能力和社会发展能力两大能力体系多重能力要素相结合所组成的系统结构体系。在众多的能力要素当中，增加社会资源能力显然是所有能力要素当中最直接也最核心的能力，而经济增长能力毋庸置疑又是增加社会资源能力当中最重要的能力。经济发展既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职能，也是政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能力强弱的集中体现，是政府能力其它要素提升的根本保障。一方面，现代国家政府往往通过制定和执行经济发展方面的公共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以巩固政治统治。S.N. 艾森斯塔曾经指出，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正是通过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来实施政治控制的，他说国家应该“鼓励经济发展，由国家对经济与投资潜力的增长进行调节，以使国家从国家的富足和生产力的增加之中收益”。<sup>[5] (P131-132)</sup> 事实上，现代国家不但没有抛弃这种控制手段，甚至有强化的趋向，经济增长作为政府最重要的政绩，往往是评估政府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是政府能力的根本保障。无论是政府自身的存续，还是建设强大的国家机器，履行政府职能都需要以一定的财力资源作为必要前提。如果政府不能从社会中汲取一定的财力资源，政府将会变得越来越虚弱，不堪一击。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维持任何暴力统治都需要一定的外在物质手段，对这种物质手段的垄断就成为国家能力强弱的主要表现”。<sup>[6] (P905)</sup> 财力资源是国家的神经，一个高度有效的政府应能从社会中动员、掌握必要的财力资源，并运用这些资源实现中

央决策者所理解的国家利益。恩格斯说：“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sup>[71] (P54)</sup>“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sup>[81] (P32)</sup>“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生活的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sup>[91] (P221)</sup>没有足够的财力资源作后盾，政府连基本运作都谈不上，遑论职能的履行，自身的强大。然而，汲取资源的前提是社会有资源可汲取。总之，正如汉密尔顿所言：“货币被恰当地看做国家的重大要素，是维持国家的生命和行动，并使它能够执行其最主要职能的东西。因此，在社会资源容许的范围内，有足够的权力获得经常而充分的货币供应，被认为是每种政体所不可缺少的要素。由于这方面的缺乏，以下两种弊端必然会产生一种：不是人民必然遭到不断掠夺，作为代替供应公众需要的比较适当的办法，就是政府必然陷入致命的萎缩状态，并且在短时间内灭亡”。<sup>[10] (P145-146)</sup>显而易见，政府能力强弱与经济增长有着天然的联系。

(三) 经济增长是现代国家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统治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承认，是因为统治得以建立的规则或基础是被统治者可以接受的乃至认可、同意的。<sup>[111] (P184)</sup>合法化能力不足或出现合法性危机，政府的任何政策失败都有可能导致政府的垮台或整个政治体系的崩溃。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指出：“当合法性受到侵蚀时，政府的麻烦事就来了。人们感到没有太多的必要去交税和遵守法律。不遵守法律不再被看作是肮脏和不诚实的。更有甚者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内乱”。<sup>[12] (P5)</sup>民主选举、政府绩效、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等都是政府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然而，在谈到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时，政治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经济发展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保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提供安全保障以抵御外敌入侵和内部骚乱，公平对待所有的人，这些都助于政府提高它的合法性”。<sup>[12] (P5)</sup>事实上，即使在现代民主国家，经济增长作为政府最重要的政绩，仍然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在专制国家和威权国家，经济增长几乎成为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源泉，救命稻草。阿尔蒙德在谈到合法性问题也曾指出：“即使在最传统的社会里，统治合法性的标准也包含着人们对政府作为的某些长期的期望。如果一旦作物歉收，敌人入侵，洪水成灾，那么皇帝就可能失去像帝制中国那种‘受

命于天’的权力；酋长就可能失去他的权威；封建领主就可能失去农奴对他的忠顺”。<sup>[31] (P8)</sup>通过对20世纪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考察，塞缪尔·亨廷顿在谈到政绩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来源在维护政治统治中的角色时指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威权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秘鲁和菲律宾，威权政权的领袖们许诺要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在多数其他国家，他们许诺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令人不满意的经济表现同样也在造成七十年代威权政权的危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sup>[13] (P59)</sup>一个没有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的国家，商品短缺，社会落后，要想获得公众对政治体系永久地认同与支持，无异于天方夜谭。王绍光等人指出：“国家实施其社会经济政策的能力是三种国家能力的关键：这种能力强的话，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就不会弱；合法性基础坚实，自然社会控制就不会那么困难了”。<sup>[14] (P6)</sup>总之，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资源的不断丰富，无疑是维持政治统治的根基。

(四) 经济增长有利于民主理念的培养与民主制度的生成

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是政治的最终价值追求，为了达成此目标，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与实践，他们最终发现并选择了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实现和维护政治稳定方面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政体。究其原因，在于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以及由此理念建构的制度设计，为实现和维持政治的动态稳定与平衡提供了可能和保障。一方面，民主理念与制度有助于及时处理和妥善解决业已发生的各种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和事件，是实现政治稳定标本兼治的基础；另一方面，民主理念与制度也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各种不稳定因素的滋生，为维护社会政治大局的长久稳定提供了可能。总之，民主政治是一套实现政治稳定的长效机制。所以，以至于有人说“民主立国是政治稳定的大前提”。<sup>[15]</sup>戴维·赫尔德也曾经指出：“民主的思想是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体现了自由、平等和公正等诸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而且它是可以联系和协调相互竞争的既有问题的一种价值”。<sup>[16] (P377)</sup>因为，民主政治它所内含的信任、妥协、宽容、法治等政治理念，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精神”，这些理念是民主政治较之其它政治制度的进步，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它为实现政治稳定提供了价值基石，也为架起民主通往政治稳定的桥梁

提供了理念支撑。毋庸置疑,经济增长在使社会集团之间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民主价值观念的形成,培育了人际之间的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促进了社会政治主体之间的融合与妥协,催化了市民社会的成长,推动中产阶级走向成熟,而这些特性都与政治稳定的要求相一致。利普塞特在谈到经济增长对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影响时指出:“财富的增长改变了阶级结构的形状,从以大量下层阶级为基础的伸长的金字塔形,变成中产阶级增多的菱形,从而也影响到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使温和的民主党获胜而使极端主义团体受挫,这样就缓和了冲突”,“作为抵消力量而起作用的那些居间组织,似乎也同样与国民财富有关”,因为“境况愈富裕、教育程度愈高就愈有可能参加自愿性组织,喜欢组织这种团体似乎是在一定国家内收入水平及有闲空机会的作用”。<sup>[4] (P45-46)</sup>经济增长使人们不再为生存和基本生活担忧,他们有更多时间从事自由结社进入公共领域,讨论公共问题,促进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相互协商、相互妥协、相互宽容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促进社会资本的壮大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的建立,这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多渠道,为公民怨愤发泄提供了更多缓冲平台,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协商架起了桥梁,从而起到预防与缓解政治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

## 二、作为政治稳定“陷阱”的经济增长

在上述情况下,经济增长确实会促进政治稳定,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实现,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经济增长则有可能严重地破坏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稳定,也不会自然地解决和调节社会矛盾。<sup>[17] (P721)</sup>尤其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动员、政治参与、不平等和政治腐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有可能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经济持续性的高速增长是一个连续性的破坏过程,<sup>[18]</sup>“尤其在社会急剧转型,经济高速增长期,这种冲突就容易形成不稳定因素”。<sup>[19] (P143)</sup>奥尔森也认为经济增长会产生不稳定效应,增长是一种使社会产生紊乱和错位的力量。塞缪尔·亨廷顿基于他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化中国家的现实考察得出:“在现代化中社会,不安定一般不产生于最贫穷或最落后的地区,而几乎总是发源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随着经济日趋都市化,政治也越来越不安

定”。<sup>[11] (P74)</sup>经验研究也表明,许多国家由不发达到达发达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冲突会经历一个呈“驼峰形”(hump-shape)规律的变化过程,在经济高速增长初期往往伴随着社会冲突的急剧增加,然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冲突开始减缓,这个过程呈现出一个类似于驼峰的形状。<sup>[20] (P3)</sup>总而言之,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引起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 (一)经济增长引发的政治需求扩大往往导致政治系统功能不足

伴随经济增长的过程,出现政治系统功能不足,无法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常常是引发社会政治不稳定的直接根源。关于此,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有过经典论述。他认为,经济落后国家由于贫穷,人们往往政治冷漠,不关心政治,他们只关心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利益。但是,伴随“都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传播媒介为大众所利用,都提高了人们的追求与期望,如果他们得不到满足,那么这些追求和期望就会刺激个人和群众参与到政治中去”。<sup>[11] (P47-51)</sup>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不断扩大的城市化,造成了部分人的明显失落感;不断增多的利益诉求与表达渠道堵塞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公众的不满情绪。而大众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却在不断地让这些失落感与不满情绪蔓延、扩展与亢奋,迫使人们向政府提出政治利益表达的诉求。然而,由于现代化中国家往往缺乏足够的社会流动机会,也缺乏高度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对公众提出的政治诉求,难以得到有效表达和满足,在政治体系内部得到减缓与聚合。因此,“随着社会的不断繁荣,人们的要求和欲望也相应增加了。正在那时,传统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权威,人们越来越大的胃口使得他们的要求变得更加迫切,而且他们对控制也越来越感到不耐烦”,<sup>[20] (P154)</sup>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缺乏对幸福的引导和实现能力,对现实不满的力量就不能在合理的规范下释放,就会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滞留、积蓄,酝酿成反叛的激情”。<sup>[22] (P138)</sup>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体系,无论是功能性还是适应性方面的改善都往往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样就使得政治体系很难满足社会公众迅速增长的政治需求,而一旦“在缺少具有适应力强和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参与的扩大就意味着不安定和暴乱”。<sup>[1] (P47)</sup>经济增长也孕育了新社会群体的形成,那些经济地位迅速提高的社会群体即新富阶层,必然要寻求与新的

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如果政治体系不能有效满足和整合他们的政治诉求,必将引起这部分人的不满,从而引起政治的不稳定。因此,正如胡鞍钢所言,如果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加快政治体制变革,经济增长就会与社会政治制度脱节,两者不能形成协调互动的促进关系,经济增长不但无益于社会政治稳定,而且可能加剧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因利益调整所引起的矛盾、摩擦和冲突,从而增加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对社会与政治稳定构成日趋严重的挑战与威胁。<sup>[23] (P4)</sup> 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印度传统社会结构下,人民存在着一种政治沉寂状态,而社会稳定是这种政治冷淡态度的副产品。但是,随着印度经济发展而走向现代化,公众产生了新的社会要求,从而打破了沉寂状态,社会活跃了,也不稳定了。

(二) 经济增长往往伴随政治腐败——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出现

政治腐败会加剧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成本,破坏正常的政治生活秩序。政治腐败还会损害政府形象,打击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导致公众丧失对政府认同的支持,降低政府威信,浪费一个国家拥有的最重要资源,也是政治体系赖以运行的基础,即政府的合法性,从而分解社会的有机整合,引发社会动乱。因此,严重的腐败现象往往酝酿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如果不对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采取有力措施,就必然会侵蚀政府的权威。如果这种情况出现,轻者会断送改革大业,重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就会连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也无法维持”。<sup>[24] (P309)</sup> 一个政府的腐败将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哪一类国家,只要搞腐败,必然要垮台。反不了腐败,也必然垮台,腐败是合法性的侵蚀者,腐败是政府的掘墓人。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为政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因为“群众对自己不得担任公职,不一定感觉懊恼,他们甚至乐于不问公务,专管家业;但一听到公务人员侵蚀公款,他们就深恶痛绝;他们因此才感觉自己在名利两方面都有所损失了”。<sup>[25] (P274)</sup> 然而,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由于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运行机制不健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政府对经济的推动和干预,对经济运行的全方位介入,这就为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结合和交易提供了机会,为政治腐败的

盛行提供了温床。一方面,拥有政治权力的人试图用权力换取金钱、美色、地位等各种利益,导致权力的资本化;另一方面,资本也向政治权力靠拢,寻求权力的庇护,用金钱购买权力,出现资本的权力化。正所谓经济利益一旦与政治权力走向联合,权力必然导致邪恶。经济增长还很容易导致政府自身行为的私利化,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营利性经营活动,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层层下达经济增长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政府官员与企业甚至私下结合。这些现象显然会造成经济和社会生活规则受到破坏,法律执行效率降低,社会公平得不到应有保证,分散政府对自身职能的专注,带来的消极后果非常明显:一是政府功能的畸变,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二是政府功能的失效与社会生活的失序,意味着政府“调节器”与“平衡杆”作用的丧失,导致政治秩序的失衡。对此,孙立平指出:“现代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了味,即政府本身成为利益主体,而且在一些地方,政府和资本之间成了分利联盟”,“凡是涉及到政府过多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并且在其中成为利益主体的,政府作为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维护者的作用必然会打折扣”。<sup>[26] (P64)</sup> 由此看来,经济增长的过程要完全避免腐败几乎不可能,这就为社会政治不稳定设下了“陷阱”。

(三) 经济增长过程往往伴随贫富差距与不平等的扩大

如果伴随经济的增长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大多数人并不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它所带来的好处仅仅属于少数人或被少数人垄断,而大多数人却在承受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或者当政府对这种不平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是政府在直接制造这种不平等的时候,那么这种不平等与贫富差距就会变得令人们难以接受,就会种下社会动乱的种子。因为“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是能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sup>[25] (P205)</sup> 因为“经济不平等一旦转变为政治不平等就成为罪恶”。<sup>[27] (P45)</sup> 在贫富差距存在绝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sup>[3] (P230)</sup> 然而,古今事实都表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之间的关系是呈曲线型的,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随着用于投资的资本积累和现代经济成分的出现,收入不均的情况会加剧。而当经济发展进入较高的阶段时,这

种情况就会减少。<sup>[31] (P36)</sup>这种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均并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往往会引发他们对现有政治体系的不满。如果现有的国家政治体制不能起到减压的作用,缺少政治协调机制,那些认为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人便会通过罢工、叛乱或政治游行来宣泄不满。所有这些都引发社会政治不稳定(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 SPI)。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SPI。<sup>[28] (P165)</sup>事实上,不平等几乎是现代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孪生物”。由于既定的社会结构和个人因素,加上财富分配方式固有的内在缺陷,虽然从长远看,经济发展会创造出无论是结果还是程序上都比传统社会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但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往往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成果往往被少数人垄断,而由此产生的弊害却会由多数人去分担,相对的穷人数量实际上在增加。“事实证明,财富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发挥积极作用;尽管人均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增强了统治精英管治民众的实力,却极少缓解本国民众的贫困”。<sup>[29]</sup>在不突破传统分配结构的体制中,经济增长对于穷人来说,并无多大意义,他们依然贫穷,并不会因此得到多大改善。因此“增长本身并不带来‘更好的’分配,即并不带来更公平地或更公正地分配”,<sup>[30] (P131)</sup>而且“不管在物质财富方面的平等取得多大的进展,它都不能消除地位的不平等”。<sup>[30] (P24)</sup>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不平等往往是把强势群体获益的成本建立在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基础之上;把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本转嫁给农村地区;把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本转嫁给落后地区等方式进行的,因此不平等就造成乐群体之间的嫉妒与敌意。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现代化带来的一个严重的政治后果是,它造成了乡村与城市的差距。这种差距的确是正经历着飞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很突出的政治特征。它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整合的主要障碍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障碍的话)”。<sup>[1] (P71-72)</sup>如果政府在短时期内无法改变这种过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状况,那么政府就很容易成为底层社会造反的目标与对象。因为,严重的不平等必然不受社会欢迎,而极端的不平等,某些人会认为,简直就是野蛮状态。<sup>[31] (P90)</sup>总之,经济增长的过程,无论采取怎样的标准来衡量,总有一些社会成员居于不满分子,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富和权力是无法绝对平均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手中。

#### (四)经济增长的拐点往往引发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

托克维尔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时说:“社会动乱往往并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和落后的国家,而是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后突然出现的那个拐点”。<sup>[32] (P208)</sup>事实上,法国大革命也确实并非发生在法国经济最困难、最糟糕的时候,也不是发生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们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它恰恰发生在法国经济经历了路易十六统治最繁荣时期,甚至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样发展迅速。大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与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的地方,恰恰也是当时社会发展进步最明显也最繁荣的地方。由此看来,社会动乱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而最经常的情况是,社会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突然出现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下滑导致人民生活条件较之以前出现下降或困难时期。毋庸置疑,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经济增长对一个以政绩作为其合法性来源的政党与政府更重要。“不过,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为政绩困局的东西”。<sup>[13] (P59)</sup>经济增长并不能永久性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尤其当经济经历长期快速增长之后,如果突然出现拐点,就极易引起公众期望与现实差距的“堕距”心理,从而引起公众不满,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及执政能力产生质疑,从而引发合法性危机。经济发展理论与各国经济发展实践告诉我们,任何一国经济发展过程都具有波动性,不可能永远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而且经济危机发生是周期性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会会出现下滑或停滞的情况。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是经济增长出现下滑的显著标志。然而,“无数的事实证明,如果不及时地治理通货膨胀,任其兴风作浪,势必人心浮动,引发骚乱”,“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疾病,这种疾病如不及时治疗就会毁灭社会”。<sup>[33] (P223)</sup>例子不胜枚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为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德国的恶性膨胀为纳粹主义铺平了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的通货膨胀——在1954年那一年就在100%左右——产生了一个军人政府,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1973年智利的阿连德被推翻,以及1976年阿根廷的伊莎贝尔·庇隆政府的倒台,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以后,军人集团就在这两个国家掌了权。毫无疑问,经济增长的波动对这

些国家的政治冲突起到了推波逐浪的作用,甚至直接引发了战争与革命。西方舆论甚至惊呼,通货膨胀是社会炸药,在当前的工业化世界,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通常是伴随着战争或者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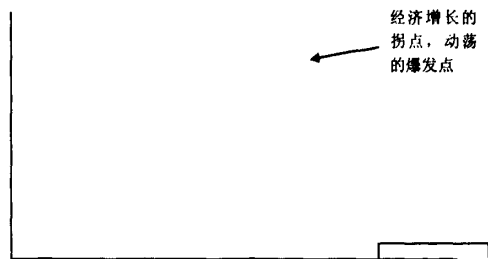


图2 经济增长的拐点与政治冲突的爆发点

### 三、通往政治稳定之路的经济增长

如果仅从表面感知出发,也许你会轻易地作出判断:经济落后引发政治动荡,经济增长造就政治稳定。然而,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贫穷落后与政治动乱之间这种表面上的联系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确实是政治稳定的坚实基础,很难想象一个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国家能够实现长治久安。即使暂时的贫困能够维持暂时的稳定,但因其与社会发展历史潮流相悖,它终究无法永远维持下去。但是,经济增长却并不必然促成政治稳定,它们之间并非完全同向运行。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的“伴生物”,时刻侵蚀着经济增长孕育的稳定基因。事实上,经济增长率与政治不安定之间的关系是随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变化的:倘若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那么二者间存在着正比关系;倘若是在中等经济发展的水平,二者存在几乎无关联性;倘若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二者便存在着反比例关系。<sup>[1] (P54)</sup>“经济发展一旦起步,并不一定会顺利前进而不中断。经济发展本身,尤其是在其早期阶段,会造成社会和政治的高度紧张,从而破坏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稳定局面”。<sup>[34] (P56-58)</sup>中国学者蔡拓也指出:“市场经济的高度完善和发展无疑会促进社会政治稳定,但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却不一定给政治稳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在它的初期甚至中期,还会伴随着大量非稳定因素的滋长”。<sup>[35] (P217)</sup>“其实,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一方面的进步未必就同另一方面的进步有关。在某些条件下,经济发展计划可能会促进政治稳定;然而,在其他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则可能严重地破坏政治稳定”。<sup>[1] (P6)</sup>拉尔夫·达仁道夫更是直接地指出:“如果伴随

经济增长的同时而公民权利供给不足,这是现代国家社会冲突产生的根源”。<sup>[30] (前P3)</sup>由此看来,经济增长对于政治稳定而言,其功能表现为双向效应:它既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也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陷阱”。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因为,没有经济增长的分配,必然产生激烈冲突;但是,如果经济增长条件下分配不公,则将会引致更大的冲突;如果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仅仅对富人有利或者富人享受的利益远远大于穷人,那么随着不平等的加剧,穷人必将对政府施压,激起强烈反抗。因为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必然影响到对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在一个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穷人几乎没能控制任何政治资源,大量的政治资源被控制在富裕阶层手里,利益表达渠道被富人垄断,在这种情况下,穷人要么选择保持沉默,要么选择非制度化、非常规化手段来进行利益表达与宣泄,从而引起政治冲突。没有任何政府能在经济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维持政治稳定。因此,要使经济增长成为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基因,其必由之路必然是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而尽量避免它的负效应。为此,需要转变经济增长类型,变“不公平的经济增长”为“公平的经济增长”,尽可能让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从这种增长中受益,并且平等收益;需要完善政治系统功能,使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尤其是政治利益表达功能,让公众的政治诉求能够在制度化的政治体系内得到宣泄与表达,避免采取非制度化的表达引发社会不稳定;需要防止政治腐败,避免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交合,牺牲公众的利益作为代价;需要提升政府的合法性,防止由于经济增长的波动引发公众对政府的质疑,甚至出现合法性危机等等。只有这样,经济增长才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而不是“陷阱”。

### 参考文献:

- [1]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 [2] 虞崇胜.政治文明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19.
- [3]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4] 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刘钢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5] 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M].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 [6]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M].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8.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 [10]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11]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12] 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M].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13]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14] 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 [15] 陶德麟.社会稳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429.
- [16] 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77.
- [17] 胡鞍钢.影响决策的国情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 [18] 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发展前景[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认为,因为经济增长对各个部门(即构成总人口的各种集团)的影响大不相同,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增长较慢部门的人口集团较之增长较快部门的人口集团相对所损,他们付出的代价往往不是少数受惠者获得利益所能补偿的,因而可能会产生摩擦和对抗。其本质指经济增长不可能使全部社会全体成员受益,更不可能他们都平均受益。
- [19] 李拓.和谐与冲突——新时期中国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 [20] 刘涛雄.社会冲突与经济增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 [21] 罗伯特·杰克曼.不需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M].欧阳景根,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 [22] 王海光.旋转的历史——社会运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23] 胡鞍钢.胡联合·转型与稳定——中国如何实现长治久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24] 黎鸣.中国的危机与思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M],1989.
- [2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 [26] 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 [27] 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M].周端,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 [28] 布鲁克·布恩诺·德·梅斯奎塔.希尔顿·L·鲁特.繁荣的治理之道[M].叶娟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29] 托马斯·鲍吉.增长与不平等:浅析全球经济社会形势与政策[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8,(8).
- [30] 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M].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31]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颐,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3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33] 邓伟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34] 吉利斯,帕金斯,斯诺德拉斯.发展经济学[M].李荣昌,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 [35] 蔡拓.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侯德彬

## Pie and Pit: the Two-way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Political Stability

HUANG Yi-feng

(Party School of Jiangxi CPC Committee, Nanchang 330003,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growth is good for political stability to some extent. But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Actually,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re two independent goals. The “commitment” of the former constantly affects the elements of the latter. Growth will produce some two-way effect, becoming both a pie and a pit of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correct way of achieving political stability through economic growth is to make full use of its positive effects while overcoming its negative effects.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political stability; two-way effect